



朱文忠等 著

戈尔巴乔夫与改革

复旦大学出版社

K83.5/2.753/1

75421

戈 尔 巴 乔 夫 与 改 革

朱文忠 张同俊 著
王春生 王伯军

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2726/17
责任编辑 徐志新

邬红伟

责任校对 陆宏光

戈尔巴乔夫与改革

朱文忠 张同俊 著

王春生 王伯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7,000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309-00371-3/D·23

定价: 2.20 元

前 言

戈尔巴乔夫是当今世界的风云人物，为世人所瞩目。人们对于他的身世、工作经历，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前景等等，都是颇感兴趣的。人们之所以这样关注戈尔巴乔夫，不仅因为他成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首脑，更主要的还因为他是一位改革家，是他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源地苏联，提出要根本改革、全面改革旧体制，把早在五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是他提出要用辩证的新思维取代教条的旧思维，用公开性取代神秘化，用人道社会主义取代行政社会主义，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努力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

本书作为一本通俗读物，试图对上述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作概括、通俗的介绍，在第一部分“新型的总书记”中，简要介绍了戈尔巴乔夫的生平及其改革思想发展的轮廓；二、三、四部分分别介绍了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改革；最后一部分展望戈尔巴乔夫倡导的苏联改革的前景。

本书是我和我的研究生张同俊、王春生以及王伯军同志结合教学共同编写的。张同俊对部分初稿进行了加工，最后由我修改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并得到北

京、东北等地的苏联问题专家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徐志新、邬红伟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徐志新同志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认真细致地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可敬可佩。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他的改革理论还在不断充实完善，而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挂一漏万、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朱文忠

1988年7月于复旦大学 苏联东欧研究室

目 录

前 言.....	1
----------	---

一、新型的总书记.....	1
---------------	---

动荡中成长的新一代苏维埃人.....	2
--------------------	---

从斯塔夫罗波尔到克里姆林宫.....	6
--------------------	---

除了改革，别无他途.....	12
----------------	----

二、经济改革.....	26
-------------	----

企业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	26
------------------	----

从直接管理转向服务、协调和平衡.....	30
----------------------	----

农业改革的铺开.....	32
--------------	----

个体劳动的兴起.....	39
--------------	----

坚持社会公正.....	43
-------------	----

加速科技进步.....	50
-------------	----

三、政治改革.....	61
-------------	----

党是改革的发动机和保证.....	61
------------------	----

“行政社会主义”的变革.....	68
------------------	----

阻碍改革的人必须走开.....	73
-----------------	----

批评无禁区 公开无限制	80
更多一点民主 更多一点社会主义	90
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	96
改革背后一刀——民族动乱	102
四、外交政策的调整	109
政治新思维	109
“砸掉核断头台”	116
“尽管有分歧仍可打交道”	124
“谁也不能垄断真理”	128
尽快寻求这里的解决方案	136
五、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对苏联改革的展望	146
附一 苏联改革大事记 (1985.3.10—1988.7.1)	155
附二 戈尔巴乔夫履历	184
附三 葛罗米柯在推荐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时的讲话	186

一、新型的总书记

莫斯科红场上连续不断的哀乐声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续失去了三位总书记，这在苏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85年3月11日，54岁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此，老弱多病、缺乏生气、无所作为的一代，被年轻力壮、精明能干、柔中有刚的戈尔巴乔夫所代替，这标志着苏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过程的开始。对于这种交替，国内外舆论界期望已久了。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休厄林·比亚勒在访问苏联后的一本回忆录中写道：“3月3日，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去世前七天，我离开了莫斯科。我的心情既忧郁、失望，又愤懑、难受。忧郁的是这个国家面临重重困难；失望的是现在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无所作为；愤懑的是党的领导层的老一代拒绝交权；难受的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强国竟基本上处于老人领导的状况中。”一位22岁的苏联青年学生说：“我崇拜戈尔巴乔夫，只有他是明智的，其余的领导人老是想违反自然规律，弄到后来还是回到原地。”著名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在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后对戈氏也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这是一位更为灵活的、更能作出富有新意的决定的政治活动家，我认为，

在人类历史如此重要的时刻，一个伟大的国家正需要这样的领导人。”

动荡中成长的新一代苏维埃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历任领袖中唯一于十月革命后出生的^①。他1931年3月2日诞生于高加索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尔代斯克区普里沃尔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祖父是名老布尔什维克，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积极分子，1931年在普里沃尔诺耶村里建立的第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的父亲原先是农机站的修理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上了前线，战后从事过经济工作，后来成为一名地方干部，1976年去世。戈尔巴乔夫的母亲今天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独自一人住在老家普里沃利诺耶。戈尔巴乔夫每年至少回家探望母亲一次。

三十年代初的斯塔夫罗波尔同苏联整个农村一样，席卷着一场农业集体化运动。戈氏诞生的1931年正是集体化高潮中的一年，也是“一五”计划中极为困难的一年。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强迫命令，工业化发展对食品要求的增加，出现了对农民的强征滥购，于是农村到处出现大批宰杀马匹和牲畜的现象，其结果导致1932年的大灾荒。苏联作家科斯特林在描写该地区当时的凄凉景象时写道：“有一次，我有机会穿过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十几个村庄，沿着顿河、库班河走去

^① 戈尔巴乔夫以前的七位领袖（列宁1870—1924、斯大林1879—1953、马林科夫1902—1987、赫鲁晓夫1894—1971、勃列日涅夫1906—1982、安德罗波夫1914—1983和契尔年科1911—1985）都是十月革命前出生的。

……所到之处房屋窗子上都钉着木板，场上空空如也，田野里到处扔着各种工具，一片荒芜景象，死亡率高得可怕，特别是孩子们死得更多。

在去斯塔夫罗波尔的荒凉的路上，我遇着一个农民，挎着一个背包。我们都停下来，吸一支烟相互问候，我问他：

‘同志，你这是去那儿呀。’

‘去牢房’。

惊异使得我说不出什么来，也没问什么。我只是吃惊地看着这位老人……他静静地抽着烟，十分平静地把他的事告诉我。他是一个中农，被判十年徒刑……那是因为他不愿加入集体农庄，而且在村庄的会议上说了一些得罪当权者的话，村中的警察没有时间，或者也不愿押送他去斯塔夫罗波尔，所以他只好独自一人前往。”

戈尔巴乔夫的童年就是在动荡和灾难中度过的。少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又遇上了战争的浩劫。

1941年6月，戈尔巴乔夫刚度过十周岁生日不久，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苏战争。父亲应征入伍去了前线，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一度被德军占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母亲玛丽亚相依为命。玛丽亚最近在接受苏联电视采访时回忆说，大战期间，戈尔巴乔夫有一次连续几个月无法上学，因为没有鞋子可穿。他的父亲得知这种情形后，立刻写信回家，要玛丽亚马上变卖任何东西去买鞋子，因为“米夏”（戈尔巴乔夫的小名）一定要上学。

战后苏联在农业上遇到了极大困难，在多年战祸之后，紧接着又是几乎遍及全国的大旱灾，粮食产量连续数年低于战前（1937年是9700万吨）和革命前（1913年是8600万吨）的

水平。1949年戈尔巴乔夫的故乡普里沃尔诺耶村获得了丰收，超额完成了计划。许多干部、农民获得了政府的奖励，18岁的戈尔巴乔夫也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1950年，共青团员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一名预备党员，1952年转为正式党员。

戈尔巴乔夫19岁那年有幸进入苏联的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1950年到1955年正是苏联历史、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斯大林的逝世，贝利亚的被捕、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平反，对个人迷信的批判等等，在苏联党和国家的生活中，在青年学生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时的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何认识，尚无充分的材料加以说明，但是从他的同学的回忆来看，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盲从权威、迷信书本的人。他的同窗好友，曾经是捷共中央书记的兹德涅夫·姆利纳尔回忆道：“1952年，在斯大林主义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学习苏联的官方历史教科书，它要我们相信，任何与上边确定的路线不同的想法都属于‘反党倾向’。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对我说，‘列宁也没有叫人逮捕马尔托夫，而是让他离境出走。’当然，如今在苏联，再有人说这类的话，也不会被视为异端。但在1952年，戈尔巴乔夫说出这样的话，表明他对当时以对某一路线支持与否区分好人和罪犯的作法，表示怀疑。当时他就认为，社会上存在着反对者、批评者和革新者，不能把他们都说成是罪犯。此外，戈尔巴乔夫把他的上述观点告诉了一个外国同学，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寻常的。一个有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姆利纳尔在回忆他的老同学在对待理论与实践、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时写道：“戈尔巴乔夫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把黑格尔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这句名言，作为自己最喜欢的座右铭。当苏联教员或学生脱离实际情况、空谈一般原则时，他总爱重复黑格尔的这句话。和许多苏联大学生不同，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死记硬背的公式，而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尽管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但我相信，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已经变成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诚然，在今天，戈尔巴乔夫通过亲身经历，会知道权力为何物，政治实践为何物，实践与理论的差别又在那里。但我认为，像他这样一个人，不会把政治和权力当作追求的目的。他从来不是玩世不恭的人。就其性格而言，他是个把政治视为手段、把人的需要视为目标的革新者。”

姆利纳尔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比较现实。他说：“当我们学习集体农庄条例时，戈尔巴乔夫对我说集体农庄条例在日常生活中毫无用处，而野蛮的暴力又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只有暴力才能保证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有一次姆利纳尔从电影《库班哥萨克》（即《幸福的生活》）中看到庄员的餐桌上摆满美味佳肴，戈尔巴乔夫告诉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毕业前一年，1954年初，戈尔巴乔夫同哲学系同学赖莎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举行了热闹而简朴的婚礼。赖莎比戈尔巴乔夫小一岁，1932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区的鲁布措夫斯克，她的父亲是位铁路工程师。1950年秋，18岁的赖莎考进了莫斯科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系。哲学系与法律系的同学住在同一幢楼，一次邂逅相遇不仅使他们认识了，而且还渐

渐地相爱了。

从斯塔夫罗波尔到克里姆林宫

1955年6月，戈尔巴乔夫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和赖莎一起回到了他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被分配从事共青团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第一书记，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62年3月，调任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庄农场生产管理局的负责人。

从1959年以来，苏联农业生产一直搞得很糟，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新的改革运动。在1962年3月的中央全会上，他提议将过去根据地区建立的党组织改为按生产区建立。每个生产区包括25个到3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和原来的地方党组织不同，只负责农业生产。每一个农业生产区都配上一批农业专家作为视察员和顾问。市委和边疆区委还任命一个党的组织员，斯塔夫罗波尔区有农业人口140万，分成14个农业生产区，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一个区的党的组织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一件完全陌生的工作，仅凭他曾开过收割机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他于1962年9月进入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函授班学习。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农业方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到这一年的年底，他就被调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负责管理干部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函授学习，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在1967年完成了全部函授课程，获得了农业经济学专业的毕业文凭，这对于他以后的发展是颇为重要的。

同年，34岁的赖莎·戈尔巴乔娃，完成了题为《集体农庄农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社会调查》的博士论文，并在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获得了哲学博士（一说副博士）学位。据赖莎自己说，她在调查中应用了当时在苏联很少有人运用的社会学的方法，她的调查方法和材料来源包括：（一）查阅官方的统计资料、地方党政机关的报告和分析、农庄和村社提供的数据；（二）对不同地区的五个农庄专门进行了社会调查，曾采用问卷（收回3000多份）、蹲点考察、个别访问、谈心提问等方式，听取保持传统习惯和态度的老农民的口头叙述；（三）查看档案和科学书刊。这份调查为人们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农村的生活条件提供了方便。斯塔夫罗波尔共有3119个农村住宅区、村子和农庄，而公用服务设施却寥寥无几，赖莎推算出农村居民使用的服务设施只有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到60年代中期，虽然有一半庄员分到了新居，或重修了旧房，但是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没有统一的供暖设施、下水道和自来水。

赖莎还调查了斯塔夫罗波尔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情况。如图书馆利用率和看电影的次数。她指出，尽管农村居民渴望得到教育，但是农村教育事业仍然是落后的。在老一代农民中仍有许多目不识丁的文盲。赖莎把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供奉圣像的数目进行对比。当时，非熟练农业工人中，有66.6%的家庭供奉圣像，而农民知识分子中，只有16.6%的家庭供奉圣像。

赖莎在论文中对不同地区的集体农庄、对农庄内部熟练程度不同的工人，以及产业工人与集体农庄庄员之间的差别

进行了比较。六十年代中期，有的农庄一个劳动日只付2~3个卢布，而另外一些农庄却付4~5个卢布，甚至更多。1964年，在斯塔夫罗波尔的集体农庄里，非熟练农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30~50卢布；熟练工人，如挤奶工、牧工等的月平均工资为83~117卢布；农业专家每月大约是125卢布。工资高低相差约有3~4倍。这种差别比产业工人与集体农庄之间的差别还要大。这一情况向来为苏联社会学者所忽视。

赖莎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的社会调查，对戈尔巴乔夫了解实际是重要的补充，对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变革无疑起着有益的作用。

1966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负责人将近十年之后，升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一年后，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学姆利纳尔访问苏联，专程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看望老同学。这是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所以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自然就成为主要话题之一。据姆利纳尔回忆，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下台没有表示丝毫的遗憾。他认为赫鲁晓夫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保持中央对地方横加干涉的老办法，赫鲁晓夫的所谓权力下放，只不过是中央对地方进行官僚主义干涉，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基层的一种形式而已。戈尔巴乔夫说，他期望勃列日涅夫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这对于改变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是必要的，因为它幅员辽阔、各地区情况很不相同。

1968年，戈尔巴乔夫被选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不久，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调回莫斯科，担任苏联科技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0年4月11日的《真理报》报道说：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第一书记。

1971年，在苏共24大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政治舞台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两步。从这时起，戈尔巴乔夫正式步入党的高级领导层。

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期间，戈尔巴乔夫博得了改革者的美名。有一位当时同戈尔巴乔夫很熟悉的妇女回忆说，在离皮亚季戈尔斯克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农庄，戈尔巴乔夫在那里进行改革试点。他设法改善农庄庄员的生活条件，准备使家家户户能够用上天然气和电。与此同时，划出大片土地作为农庄庄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获归庄员自己所有，庄员剩余的产品允许拿到城镇出售。此外，扩大庄员的自主权，允许庄员自行决定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播种，甚至允许庄员到更多的地方更加自由地出售农产品。后来，那个农庄成为一个模范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还在集体农庄推行以产定奖的制度，对原来的控制和定额办法实行改革。由几位农民或是几户家庭按合同组成的作业队根据成本和产量来计算报酬。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斯塔夫罗波尔区约有1500个机械化作业队不再预先确定定额，而是实行以产定奖的新办法。1976年，该区党委决定在全区推广这个办法。当时《经济报》等报纸报导说，无定额作业队的水田收成提高50%，旱田提高30—40%。

尽管这样，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的知名度还是不高的，真正使他以党内农业专家的名气而平步青云的，还是库拉科夫的农业改革。库拉科夫在1960年前曾担任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71年进入政治局，是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苏联农业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收获能力差，由于收获期短，效率差，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成熟庄稼烂在

地里。1976年，库拉科夫决定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伊帕托沃区进行大面积的农业管理改革试验，着手解决丰产丰收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将人和机具组织在一个较小的单位里，一般只有少量的收割机和运输粮食的卡车。而伊帕托沃方法则是以一个较大单位为基础，叫做收割-运输综合队，它包括至少十五台联合收割机，分成三个作业组；十五辆卡车，并配备一队劳力，分工专管运送油料、收集麦秆、收割前后的辅助工作，另外还有一批人提供维修和其他的服务，昼夜二十四小时操作。这次试验在戈尔巴乔夫的积极组织和推动下获得了成功。以前，整个收获期长达三四个星期之久，而这次只花了九天时间，他们承担的二十万吨粮食也如数按时上缴国库。1977年7月16日《真理报》发布了中央委员会《关于伊帕托沃区党的组织在收割问题上进行的实验》的决定，赞扬这次试验是工艺进步的实例，号召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以及各州各边疆区党委学习这一方法并予以推广。同一天《真理报》上，以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对戈尔巴乔夫的采访，这是他第一次在《真理报》上崭露头角。

事有凑巧，1978年11月，库拉科夫突然暴病身亡。在11月27日的中央委员会例会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为中央书记，接替库拉科夫主管农业。12月初，戈尔巴乔夫告别工作了二十三年之久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前往莫斯科。他的夫人赖莎调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他们的女儿伊琳娜当时已在莫斯科，是一名医生，1978年与她的同事结婚，1979年生下一女儿，取名克塞妮亚。

戈尔巴乔夫进中央委员会之后，参与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决策过程，这就给了他显示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1979年